

林语堂与比较文学

——基于林语堂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

陈智淦¹, 王育烽²

(1. 厦门大学 嘉庚学院, 漳州 363105; 2. 厦门理工学院 外语系, 厦门 361005)

摘要: 自小接受西学教育及影响的林语堂, 在各种言论、著述中进行大量的比较文学研究。他综合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等方法展开文学研究工作, 在时间上进行历时性、共时性的全面深入论述, 在空间上进行横向的平行比较和纵向的历史影响研究。认为其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所起的传承作用不容忽视, 这与他深厚的语言学造诣、国学积累和对欧美科学研究方法的掌握关系密切。

关键词: 林语堂; 比较文学; 影响研究; 平行研究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13)01-0049-06

On Lin Yutang and H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search

—Based on Lin Yutang's Influence Study and Parallel Study

Chen Zhigan¹, Wang Yufeng²

(1. Tan Kah Kee College, Xiamen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105, China; 2.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Languages, 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Lin Yutang, who begins to receive Western education and is also tremendously influenced by it, does a great numbe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searches in his various remarks and articles; and he deeply discusses Sino-Western literature relationship diachronically and synchronically by comprehensively combining the influence study and parallel study. His achievements in Sino-Wester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search are so enlightening for later researchers that his transitional role in the first rise of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And this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his profound knowledge about linguistics and sinology and his excellent mastery of overseas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Key words: Lin Yuta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fluence study; parallel study

中国比较文学发轫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取得突破性的发展,这是中国比较文学由孕育降生到学科建制,并形成比较文学中国学派,

与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并驾齐驱的辉煌时期。20世纪前半叶,众多翻译家、文艺批评家、作家等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领路人和先驱者,这揭示了比较文学

收稿日期: 2012-02-29

基金项目: 漳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课题资助项目(漳社科联综[2011]7)

作者简介: 陈智淦(1979-),男,副教授。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比较文学及当代西方文艺理论。

E-mail: agun172@yahoo.com.cn

研究的巨大可能性,他们宽阔的中外文学视野、多层面的思维模式以及对中外文学在比较视阈下的深刻分析,开拓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对中外文化、文学的比较研究,“可视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在现代中国的滥觞”^{[1]23}。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另一个特殊人物——林语堂,曾就中西文学的关系、题材、结构、技巧、作家等方面也进行了深入比较。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林语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小说、轶事、幽默观、翻译、小品文(散文)、书评、文艺思想、人生哲学、文化学范畴中的文化观、与鲁迅及其他名人的关系等方面^[2],而他自觉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所起的传承作用却鲜有提及。

在美享有盛誉的华人作家林语堂,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被美国文化界列为“20世纪智慧人物”之一。他集语言学家、文学家、翻译家、发明家、出版家于一身,学养深厚、见识广博,涉及文学、语言学、哲学、历史等诸多领域,是一位具有大气象、大手笔的“通才—专家”,这一复合典型特征使得“他在中国文学史有一定的地位,但他在文学史中也许是最不容易写的一章”^[3]。林语堂曾留学于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并在德国完成博士学业。从1923年回国任教起,他便在众多的杂感、随笔、小品、美文以及演说中有意识地进行比较文学研究,这些言论著述中不乏大量文学比较意识的印迹,如《吾国与吾民》(1935)“应用了比较文化的方法,旁征博引”,《生活的艺术》(1937)“包含着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精髓”^[4]。因此,要判断林语堂对中国比较文学的传承和发展所做贡献的大小,就必须对他运用比较文学最基本的两种研究方法,即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方面所做的努力进行系统梳理与辨析,因为“在比较文学中,只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才具有方法论的意义”^{[1]42},而他这种科学治学态度形成的根源也亟待探讨。

一、林语堂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

林语堂出生于基督教家庭,他从6岁开始入小学读书启蒙到21岁大学毕业,都是在教会创办的学校接受教育,西学的影响无处不在。林语堂在厦门鼓浪屿教会小学读书时就开始接触西洋书籍,如《福尔摩斯》、《天方夜谭》、《茶花女》以及司各特、狄更斯和莫泊桑等的作品。教会教育使他的家庭传统教

育得以削弱,因此他父亲每年暑假都要给他教授传统儒家蒙学、儒家经典,如《诗经》、《声律启蒙》、《幼学琼林》等,林语堂及其兄弟姐妹“听父亲讲解儒家的经典及《诗经》,其中包含有多首优美的情歌”^{[5]8}。1916年大学毕业后的林语堂到北京清华学校任英文教员,他深感国学知识的贫乏:“我对于中国历史、中国诗、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学的知识,充满了漏洞。”^{[5]26}他遗憾自己在基督教学校受大学教育而弱化了国学的积累,开始“恶补”中国传统文化,看《红楼梦》、学北京话、逛琉璃厂,和书商谈论《人间词话》、《四库集录》等,并用大量的时间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道家和佛教文化。经受中西教育双重洗礼和精通中、英两种语言的林语堂具备深厚的文学素养、文化素养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也熟悉本国和外国文学,因此,他在处理中西文学关系时所做的影响阐释,是运用影响研究所依据的文学资料进行发掘和考证。

首先,林语堂探讨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一方面,他意识到中西作家、作品的实际联系和相互影响,尤其是中国作家、作品在国外的流传。“中国戏剧诗文在外国大出风头……熊式一把《红鬃烈马》译成英文,在伦敦演了三个多月,博得一般人士之称赏,在上海又有德人以德文唱演《牡丹亭》,白克夫人又把《水浒传》译成英文,牛津某批评家称施耐庵与荷马同一流品,德人也译《金瓶梅》,称为杰作。”^{[6]112}除此,他还注重不同国家、民族、语言之间作家的师承关系。“尼采师叔本华、萧伯纳师易卜生,虽皆非及门弟子,而思想相承,影响极大。当二子读叔本华、易卜生时,思想上起了大影响,是其思想萌芽学问生根之始”^[7];他承认自己“曾做文学侦探,探出毛姆与莫泊桑的关系……有两篇故事,毛姆与莫泊桑雷同,是由莫泊桑故事脱胎而来的”^{[8]421},他对比这两位作家在作品题材、人物、情节等方面的渊源关系后,指出“大凡文人受前人影响是难免的”^{[6]423};他在刻画自己所佩服的比利时侦探小说家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时提及:“人家称他的著作为心理小说(psychological novel),一半近似俄国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8]418}他对此并不苟同:“奚孟农的功夫,实自莫泊桑得来。莫泊桑之极力精练功夫,也是听他叔父Flaubert的训导。”^{[8]421}所以,林语堂认定的影响研究的“事实联系”是跨民族、跨国界、跨时空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了中西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互相呼应。在《说福禄特尔与中国迷》一文中,他阐述

了19世纪之前的两百年间,利玛窦、莱布尼兹、福祿特尔(即伏尔泰)等欧洲思想权威人士深受中国思想洪流的影响,在当时的欧洲,“中国孔家思想占了学人思想的中心”^{[8]410}。

其次,林语堂也不否定中国文学深受西方作品的影响,他注意到接受国的作家在创作中模仿、借鉴外国文学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作家在对外国文学的吸收和消化的过程中,要创新和借鉴他国文学的成功经验,中外文学交流的最直接、最普遍的手段是翻译,他肯定了世界(主要是欧美)各国的翻译文学作品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在讨论文学革命的时候,我们已经总结了外来文化在中国文学进步中的积极作用。这种影响的直接来源是欧洲文学的汉语译作。”^{[9]209}他详细总结了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等各国翻译作品的范围和内容,以确定外国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影响的程度,这无疑“为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保存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10]。他也非常客观、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学创作者的消化吸收能力“让年轻的中国一次吃掉这么多东西,看起来是多了一些,倘若产生消化不良倒也无可厚非”^{[9]213},但如果中国文学创作者对外国文学只是一味采取“拿来主义”的策略,则无益于中国文学自身的建设发展:“除非是做大量建设性的工作,提出些踏踏实实的设想,保持平衡的批判思维能力,否则光靠标语口号,靠华而不实的唠唠叨叨,是不会造就出一个新国家来的。”^{[9]213}他在创作中以身作则,虚心学习外国文学创作的成功经验,《京华烟云》(1937)就是林语堂对中西文学互相取长补短的典型,他不仅以纯中国小说的艺术为目标,并吸取了西方小说的优点,使得“它的结构比较缜密,聊补充中国小说的缺点”^[11]。

因此,影响研究作为比较文学中最基本的方法论,林语堂主要围绕“文学关系”展开,一方面他注重作家、作品的实际联系和影响,以及文学思潮、文学运动的互相呼应,通过对不同作家之间联系的梳理和比照,了解作家、作品在国外的流传和不同国度作家的师承关系;另一方面也强调接受国的作家在创作中的模仿、借鉴和再创作的重要性,并在实际创作中予以践行。

二、林语堂的比较文学平行研究

林语堂还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从各种角度、各个方面进行平行研究。从他对中西文学的主题、

题材、文体、文类、人物形象、语言特点等文本因素的分析研究中可以看出,这是林语堂在文学比较中所运用的重要方法。

在诗歌方面,林语堂主要分析了中西诗歌的差异性。他指出诗歌在中西方的地位不同:“诗歌对我们生活结构的渗透要比西方深得多,而不是像西方人似乎普遍认为的那样是既对之感兴趣又无所谓的东西。”^{[9]181}一方面,诗歌是中国人现实生活的需要:“就诗而论,中国不但取士用诗,楹联巧对也用诗,射覆酒令也用诗,墨盒刻字也用诗,画家题画也用诗,才女择婿也用诗,毛厕题字也用诗——这些种种是西方所无,所以说诗之深入吾人生活比在西洋普遍。”^{[6]385}另一方面,诗歌对中国人起着一种精神净化作用:“诗歌在中国已经代替了宗教的作用……诗歌教会了中国人一种生活观念,通过谚语和诗卷深切地渗入社会,给予他们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使他们对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并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人生。”^{[9]181}林语堂强调,诗歌让中国人的精神与自然融为一体,中国人的泛神论与中国人热爱大自然密切相关,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把诗歌看作中国人的宗教。

在散文方面,他主要从产生语境的条件、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阐述先秦散文与以柏拉图作品为代表的希腊散文的相同之处。他认为:“一国最精炼的散文是在谈话成为高尚艺术的时候才生出来的。在中国和希腊的散文的发展史上,这一点最为明显。……我们由《列子》、《淮南子》、《战国策》和《吕览》这些书里,可以晓得当时学者的谈话内容……这些古代中国哲学家的书籍不外是这些哲学家闲谈的结果。”^{[6]4-6}同时,中国散文的第一次重要发展在“有闲的学者的社会背景”下产生,因为“有闲的社会,才会产生谈话的艺术”^{[6]6},而“希腊散文也是在这种有闲的社会背景下勃兴的。希腊人思想那样细腻,文章那样明畅,都是得力于有闲的谈话。柏拉图之书名《对话录》(Dialogue)可为明证。《宴席》(Banquet)一篇所写的全是谈话……”^{[6]8}。林语堂为了避免以偏概全,还以中国的《周易》、《史记》、《水浒传》、《聊斋》等作品和希腊的《斐特气罗斯》序文、《共和国》等作品,从内容及其创作背景方面详细加以分析比较,以此论证随意的、谈话式的日常语言和有闲生活、有闲阶级等对中国、希腊散文的发展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说明这种共同而非孤立的现象是中西文学共有的财富,是不同民族心灵世界的共同感受与创造。因此,林语堂认为:“优秀的散文首

先必须能够反映日常生活,文言则不称此职”^{[9]174},他用“娓语文体”或“闲语文体”来印证中西文学的共同性和融合的可能性:“西人称小品笔调为‘个人笔调’(personal style),又称之为 familiar style。后者颇不易译,余前译为‘闲适笔调’,约略得之,亦可译为‘闲谈体’、‘娓语体’。盖此种文字,认读者为‘亲热的’(familiar)故交,作文时略如良朋话旧,私房娓语。”^{[6]20-21}

在戏剧方面,林语堂用类比方法提出中国杂剧与西方歌剧在结构上的相似之处,以期发现其共同性。他说,元杂剧以及元代以后杂剧“同西方戏剧一样:情节通常毫不足信,对话也无关紧要,而演唱却占据中心地位。实际的演出常常是歌剧中流行唱段的集锦,而不是一出全剧。西方的音乐会也经常采用同样的方式,造就一台歌剧选段的荟萃”^{[9]195}。他还用对比方法进行考察,以突出中西戏剧的特征差异:1)他从表现手段来分析:“中国戏剧在本质上与英国传统戏剧截然不同,歌曲时时出现,比对白更显重要”^{[9]194},因为中国的戏剧是由歌唱和日常口语中的对话结合而成的,传统意义上戏剧的表现手段是口头语言,而歌剧是音乐和歌唱的结合,所以“汉语的‘戏’字,译为英语的 drama(戏剧)容易引起误解,不如译作 opera(歌剧)。”^{[9]194}2)他从表演的技术性动作和观众感受的角度理解中国戏剧与西方歌剧的差异:“在西方,女歌剧演员们使自己的胸部并不优雅地剧烈起伏,这常使我们感到震惊;在东方,演员则用水袖佯擦无泪的眼睛,这也常使西方人感到荒唐可笑。”^{[9]195}3)他看到中西歌剧的受众群体及其作用迥然各异:“西方的歌剧是上层阶级的专利品,有钱有势的人常常是为炫耀自己的社会地位或者社交而进出剧院,而不是真的去欣赏音乐。中国的歌剧则是劳苦大众的精神食粮,它比任何其他艺术形式更加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的心灵”^{[9]196},中国戏剧中通俗化的历史、音乐等的“文化功能还在于教会了人们区别善恶的道德标准”^{[9]199}。4)他从文学与语言学的角度去分析中国文学缺乏西洋文学里悲剧材料的原因,并以霸王别姬(先杀情人后自刎)、唐明皇(杀杨贵妃后)创作雨霖铃曲等悲剧故事来说明中西悲剧的受众心理不同,他认为中国悲剧的“这种结局是不会使西洋观众满意的,可是中国人的生活是这样的,所以在文学上当然也就是这样的了”^[12]。

在小说方面,林语堂对中西小说的创作动机、文本内部和故事情节等方面进行比较。1)在创作动

机方面,他认为一切小说家都出于取悦而作,即是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促成的:“像笛福、菲尔丁和施耐庵、曹雪芹,他们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们有个故事要讲,是因为他们生来就是讲故事的人。”^{[9]203}在中国,“虽然古时著成小说,一则无名,二则无利,甚至有杀身之祸,然自有不说不快之势。中国文学可传者类皆此种隐名小说作品。”^[13]经后人考证才得知作者的匿名小说,如曹雪芹的《红楼梦》、施耐庵的《水浒传》、《金瓶梅》、以及《封神榜》等,“是为快乐和自娱而作,它的创作便纯粹出于一种真正的创作冲动,而非出于对名利的喜好”^{[9]202}。西方小说的写作动机亦然:“塞万提斯和薄伽丘写小说,也都是出于纯粹的创作快感。金钱与创作没有必然联系。”^{[9]202}2)他从小说的文本内部所作的宏观分析相当中肯。虽然中、俄小说“都使用极为现实主义的技巧,都十分爱好对细节的详述,在叙述故事时,他们都不喜欢西欧长篇小说常有的那种主观性”^{[9]207},他把《红楼梦》中家族兴衰的主线与埃德加·艾伦·坡的《厄舍古屋的倒塌》相提并论,称《红楼梦》的人物刻画、语言风格等无愧为世界名著,“其学术地位的高贵与研究卷帙的浩繁完全可以与莎士比亚和歌德的评论著作相匹敌”^{[9]204-205}。3)在故事情节的梳理上,他认为“中国的小说则像 D·H·劳伦斯的小说那样松散”,中国神怪小说《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吃了天堂里的禁桃,就像夏娃吃了伊甸园的苹果一样;他后来又像普罗米修斯那样被锁在大石底下 500 年”,《包公案》的悬念故事相比西方的侦探小说来说相对逊色,是因为包公“总是通过梦境来解决迷惑和谋杀,而不是运用福尔摩斯那样的推理……”以及“中国人科学推理的缺乏,生活的贫乏等等”^{[9]207}所致。

总之,要准确指出不同体系或作品的异同需要全面的综合知识、机敏的思维和科学的解释,林语堂在平行研究中运用类比和对比的方法,考察相互间没有关联的作家、作品,发现它们的类同和差异,以及某些相对隐形的可比性,这是他在文学比较中敏锐地全盘把握中西文学而获得的。

三、林语堂比较文学意识的形成根源

冯智强等认为:“从文言到白话,从汉语到英文,从散文、随笔到小说、传记,从翻译、创作到学术研究,从语言学家、文学家、翻译家到发明家、出版家,林语堂始终以语言学研究为基石。”^[14]《语言学论丛》(1934)是林语堂坚持科学研究方法的延续,

胡适在写《入声考》(1935)时也多次向他请教。可见,林语堂极具深厚的语言学造诣,这是他自觉形成比较文学意识的一个最重要根源。

1901年,林语堂进入西方基督教会创办的坂仔铭新小学接受教育,这是一扇通向西方知识文化的窗口。1905年,他到厦门鼓浪屿教会小学读书,开始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之后他继续在教会创办的学校,即鼓浪屿浣源书院和上海圣约翰大学完成中学、大学教育。1919年9月,林语堂到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留学,1922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辗转转到德国莱比锡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林语堂选择语言学专业,经过多年欧美学术熏陶的他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语言学,具体体现在其博士论文《古代中国语音学》。在欧洲研究中国的学问,“一面反映了林语堂在中西文化经历上的独特之处,一面又反映了视点变化和距离改变所带来的认识与方法的差异。”^{[15]29} 1923年,林语堂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同年底发表的《科学与经书》提出“用西洋学术的眼光,见识,方法,手段,及应凭的西洋书籍,来重新整理我们的国学材料”^[16],以此响应胡适提出“整理国故”的主张。1924年9月,他加入新文化社团语丝社并成为《语丝》周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在散文创作中坚持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方向,他从自己擅长的语言学专业入手,在对中西语言差异的探讨中积极支持胡适和陈独秀领导的文学革命。

五四文学革命以提倡白话文、打倒文言文开篇。林语堂融会贯通语言与文学,对中西语言文字进行比较,认为中国语言的单音组织和象形字体对文学作品的格调有直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维与文学的特性,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是源自汉语的单音节性。”^{[9]164} 虽然汉语的单音节性决定了其使用象形原则的必然性,但林语堂并不片面地看待一国语言对文学单方面的影响:“每一民族都发展了一种最适合于本民族语言特性的写作系统。”^{[9]164} 同时,林语堂也注意到中西语言在语言传承上类似:“汉语的基本构造完全是具体的并非抽象的,像盎格鲁—撒克逊语一样。而经典文学的传统留给我们的词汇,则更偏重藻饰,词义也更精确,与英语中的罗马语部分相类似。”^{[9]180} 他还从英语语言的兴起阐发汉语文学的未来:“最好的现代英语散文之所以出类拔萃,是由于它健康地融合了来自日常英语的既具体又形象的词汇和出自罗马传统的意义更确切并兼有书卷气的词汇……如果一位真正的文学巨匠将这两个因素融合在一起,那么他就会造就出一种具有最大的

表现力,最优美的散文来。”^{[9]180}

林语堂对中西文学与语言关系的对照研究论述植根于其精湛的语言学造诣。他在文学创作中强调“辞达”、“达意”等概念:“凡能尽孟子所谓辞达之义,而能表现优美的情思的,都是文学。”^{[18]180} 他从语言方面对中西文学比较印证,主要表现在他提倡文学语言须清顺自然、灵健雅致和幽默风趣等方面。

首先,林语堂认定清顺自然的语言是一国文学发展的根本前提。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作家但丁、薄伽丘用民族语言创作而带动“国民文学”的发展给了他启示:“我们提倡白话文学就先得对白话对国语有相当的信任,知道我们日常所讲的国语足以传达我们的意思,也能够传情。”^{[8]197} 林语堂对白话文学的未来充满信心,极力赞同常语、俗语的运用:“(一千年以前)那些通俗小说的作家……被迫用白话写作,以求得大众能够读懂,是他们在活的语言中奠定了文学的基础。”^{[9]179} 因此,他表示为文时不要有“作文章”的观念,而主张以业余者态度写自己的心里话:“我们要写好的白话文,一定要把‘作文章’这个观念抛弃,好好地规规矩矩地写自然的国语。很多人都在学英文,很少人去写雅顺清淡自然的英文,外国人看起来不顺口。”^{[8]202}

其次,灵健雅致是林语堂对文学语言的核心要求,因为它是文学生命源源不断的活水,这在中西文学中概莫能外。他对白话文欧化的趋势不以为然:“现在所谓新旧文学,不过谓白话与文言之不同而已。其实这都不是新旧文学之分野界线。文言白话,只是表现思想情感之工具。”^{[17]180} 因此,他倡导要做到“言文一致”或“语文一致”,文言与白话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文言与白话的自然结合能够创造出灵健雅致的新国语:“国语要雅健,也必有白话、文言二源。凡为文必先雅顺自然……而文好的,自然而然加入文言。文人作家肯大家注意这一点,文言中的精华,自会流入现代国语。也不必故意排斥文言成分,否则白话文永远不会养成文雅与劲健俱到的丰富的国语。”^{[8]227} 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早有先例:“以前《水浒》是白话的,《聊斋》是文言的,《三国演义》是白话而兼文言的。”^{[8]233} 在他看来,元曲和明清小说、小品文等都有健雅的白话,元曲就是“甚得文言白话之调和……试看《西厢》闹会曲中,有文言,有白话,而却能调和不露痕迹”^{[6]69}。他把中西健雅的语言进行比较,强调语言应该吸收口语,尤其重视俚俗语,这样文章的语言才能灵健

有力,充满生机。“西洋文学,据我所知,并无所谓大众语独别于白话者……或有一二作家,如 Will Rogers 以俚语批评时事,一针见血,极有力量,如 Ernest Hemingway 以美国口语写作小说,亦惟妙惟肖,实亦不异《水浒》、《红楼》描写口吻之绝技。”^{[6]61} 林语堂眼中的中西文学都重视灵健雅致的语言传统:“吾理想之文字乃英国之文字。英国文字,所谓最正派者(in the best tradition),乃极多土语成语之文,非书本气味之文。英国散文大家……乃有极灵健之文字,而有极好之白话……英文在各国文字中首屈一指,乃一方由其辞汇之丰富,一方由其文字之灵健(virility)……犹如中国人人能尊曹雪芹为文学正统,取之以为标准白话文,将来亦可有好白话文章,中国文字亦必灵健无疑。”^{[6]63-4} 灵健雅致的语言传统是文学的正宗,也是文学健康发展的依据。

再次,林语堂强调的语言幽默风趣也是“辞达”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形象描绘文章的趣味为饮食的酸、甜、苦、辣、咸五味,缺一不可。“咸淡为五味之正,言论要以浅显明白晓畅为主,可以读之不厌。大刀阔斧,快人快语,虽然苦涩,常是药石之言。嘲讽文章,冷峭尖利,虽觉酸辣,令人兴奋。惟清淡文字,其味隽永,读者只觉甘美,而无酸辣文章读了肚里不快之感。此小品文佳作之所以为贵。大抵西人所谓‘射他耳’ Satire(讽刺),其味辣,‘爱伦尼’ irony(俏皮),其味酸,‘幽默’ Humour(诙谐),其味甘。”^{[17]244-245} 林语堂谈文章语言之味的见解也是在文学参照下进行印证的,“现代散文之祖宗”郑板桥、李笠翁、金圣叹、金农、袁枚等人的作品“大半都含有幽默意味”;而“英文散文始祖乔索(乔叟),散文大家绥夫特(斯威夫特),小品文始祖爱迭生(艾迪生),或浑朴,或清新,或尖刻,也都含有幽默意味”^{[17]181}。

林语堂支持的文学革命包括文学语言的革命性,即由原来文人专利变为辞达,中国 17 世纪文学的辉煌就是语言自然清新、灵健雅致和幽默风趣的最好体现:“明末文学观念大解放,趋于趣味,趋于尖新,甚至趋于通俗俚浅,收民歌,评戏曲,传奇小说大昌,浩浩荡荡而来,此中国文学一大关头也。故十七世纪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放光明。”^{[6]152} 林语堂以文学语言为分析的切入点,在纷纭杂陈的中西文学世界中爬梳出相互关联的内容,并将二者相互印证,以构建自己的文学大厦,尽管这些尚未成理论体系的分析比较“多是一些材料之比照,但其意义却不可低估”^{[15]155},他在此方面所做的努力将

随着世界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而发挥其重要作用。

四、结束语

林语堂虽然没有写出规范完整的比较文学学术专著,其比较文学研究的相关论述也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但他有意识地综合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等方法展开文学研究工作,产生了一批有分量、有价值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最基本的两种研究方法,本身都有其各自的局限性,林语堂不是按照一般既有的平行比较、影响比较模式进行比较研究,而是真正深入比较研究对象的本质差异及本质相通,在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的同时又不受制于既定方式的特有框架。同时,他在研究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坚持双向阐发的原则,证明不同民族文学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总之,林语堂以大量充实的原著、史料和中外文资料作为理论构架和学术观点的基础与支撑,以史为立论出发点,对学术资料进行整理与爬梳,并将丰富的史料与学理的讨论灵活自如地熔铸于一体,这完全是他多年海外游学所获得的学养与资源产生的结果,他在比较文学中有关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论述,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国比较文学兴起后的实绩,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谱写了一支立体交叉的东西方文学双向交流的交响曲,给后来者留下深刻的启示。

参考文献:

- [1] 胡亚敏. 比较文学教程[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 [2] 傅文奇. 近十年来林语堂研究的统计与分析[J]. 福建论坛, 2006(5): 102-105.
- [3] 徐訏. 追思林语堂先生[C]//施建伟. 幽默大师: 名人笔下的林语堂, 林语堂笔下的名人.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1998: 3-29.
- [4] 高小刚. 乡愁以外: 北美华人写作中的故国想象[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96.
- [5] 林语堂. 从异教徒到基督徒[M]. 谢绮霞, 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8.
- [6] 林语堂. 拾遗集[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 [7] 林语堂. 剪佛集·大荒集[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173.
- [8] 林语堂. 无所不谈合集[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下转第 59 页)

真理与错误,成功与失败等问题上使用“双重标准”,从而造成“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辉格主义偏见。对称性原则告诉我们,对于真理与错误、成功与失败等相关问题,我们要用同样的理论框架加以分析。应该说,从“双重标准”到“对称性原则”是人类理性设计的某种进步,但是,姑且不论真理与错误、成功与失败之间的界限如何界定,在少数的真理与大量的失败之间进行对称性研究,其可行性值得探索。

(3) 用同样的原因解释真理与错误、成功与失败,在原则上似乎没有问题,但是,如何选择并确定这些所谓的“同样的原因”?布鲁尔主张用社会原因同时解释真理与错误、成功与失败,拉图尔主张用“更多的转向”同时解释真理与错误、成功与失败。孰是孰非似乎一目了然,但仔细斟酌,问题不少:如何选择并确定一种理论解释而又不陷入绝对主义?如何设计“更多的转向”而又不陷入相对主义?

(4) 用同样的一种或多种的原因同时解释真理与错误、成功与失败,这里的“解释”是什么意思?是寻找其原因还是“再现”其过程?而且,即便是寻找其原因,是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原因?是决定性原因还是影响性原因?是直接原因还是间接原因?如果是“再现”其过程,是“发现”过程还是“辩护”过程?是“制造”的过程还是“协商”的过程?

是“追随”其过程还是“参与”其过程?

参考文献:

- [1]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358.
- [2] Latour B. One More Turn After the Social Turn: Easing Science Studies into the Non-Modern World[M]//Biagioli M. 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 [3] 大卫·布鲁尔. 知识和社会意象[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1.
- [4] Latour B. Aramis, or the Love of Technology[M].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78-79.
- [5] 布鲁诺·拉图尔. 科学在行动[M]. 刘文旋,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5.
- [6] Sismondo S.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69.
- [7] Brey P.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social constructivism[J]. Society for Philosophy & Technology, 1997(2): 3-4.
- [8] 芬伯格. 可选择的现代性[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42.
- [9] 林语堂. 中国人[M]. 郝志东, 沈益洪,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7.
- [10] 冯羽. 林语堂与世界文化[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5: 114.
- [11] 林太乙. 林语堂传[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151.
- [12] 林语堂. 生活的艺术[M].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1: 105.
- [13] 林语堂. 林语堂散文经典全编(第一卷)[M]. 北京: 九州图书出版社, 1997: 562.
- [14] 冯智强, 朱一凡. 编辑出版家林语堂的编译行为研究[J]. 中国翻译, 2011(5): 27-33.
- [15] 王兆胜. 林语堂: 两脚踏中西文化[M]. 北京: 文津出版社, 2005.
- [16] 林语堂. 科学与经书[N]. 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 1923-12-01(21-24).
- [17] 林语堂. 行素集·披荆集[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上接第54页)